

门洪华 主编

中国： 大国崛起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中国能否崛起？

中国如何崛起？

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的崛起？

浙江人民出版社

D61
192

中国· 大国崛起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门洪华 主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大国崛起/门洪华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12

ISBN 7-213-02867-7

I.中... II.门... III.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239 号

中国:大国崛起

门洪华 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责任校对 张谷年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桐庐瑶琳镇)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6.7 万 插 页 2
印数 1-10000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3-02867-7**
定 价 28.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如何看待中国崛起 ——代序言

胡鞍钢

一、中国崛起：从梦想到现实

中国崛起是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一个梦想。今天我们有幸目睹并经历这一个激动人心的历史过程。

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中国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出人意料地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设想”的前两步。这一设想就是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将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的迅速崛起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我十分有信心地说，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但我也十分坦诚地说，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我们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都不允许中国发展失败。在这样的情势下，研究中国崛起就

是研究中国如何成功崛起,如何避免失败。这不仅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而且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我把研究中国国情(China Study)视为读一部“天书”,它不仅令人十分着迷,也十分难读。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社会,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是不易认识的,也不是朝夕之间就能解决的。这就需要更多的学者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观点、宏观的视野进行坚持不懈的研究,更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① 研究中国是如此,研究中国崛起战略也是如此。

中国崛起首先涉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中国能否崛起,二是能否以新的发展模式崛起。讨论这两个问题要涉及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内的发展态势,二是国际环境。提高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是各个国家都期望的,但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实现的。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是与自身的综合国力高度一致的。国力强大,就会享有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相反,国力衰微,就会被国际社会遗忘,甚至落入“落后就要挨打”的境地。中国在过去几千年,特别是最近200年的历史发展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想和平崛起于世界强国之林,就必须立足自身,放眼世界。如果没有自身力量的提升,就谈不上崛起,更谈不上和平崛起。因此,中国在谋求和平崛起时,首先要夯实崛起的国内基础。

二、中国崛起的轨迹与效应

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综观全球化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段,可以发现几乎在全球化浪潮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后进经济体能够通过恰当的贸易与投资战略有效利用全球化的发展机遇,积极推动本国产业分工的升级和深化,全面发挥本国经济的比较优势,进而创造出竞争优势,最终实现在经济总量和人均生活水平方

^① 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自序”第1页。

面的赶超,成为全球市场中处于重要地位的新全球化经济体。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重新走向经济扩展道路,这标志着新一轮经济追赶的开始。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会经历四大发展时期:世界经济的中心期(1400—1800年)、经济大国的衰落期(1820—1950年)、经济追赶期(1952—2020年)与大国复兴期(2020—2050年)。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参与程度和影响力。

在世界经济的中心期,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和全球贸易的主导者。在经济大国的衰落期,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与全球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发生了显著逆转。新中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经济追赶过程。从对世界经济参与的程度来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封闭经济条件下的追赶阶段(1950—1978年),这基本上是一个成效微弱的经济追赶的“计划经济实验”,脱离了以分工与贸易为基础的一体化发展的轨道。第二阶段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追赶阶段(1978年至今),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转型阶段,存在明显不平衡性而又充满巨大发展潜力。在经济追赶期与大国复兴期,中国经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呈“U”字形曲线轨迹变动。

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工业化追赶的历史。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演进历史来看,在现代化过程中有许多国家“后来居上”,实现了工业化追赶或超过现代化先行国,先后出现了四个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美国是第一个成功追赶的典范。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济开始起飞,用了43年的时间追赶上英国。日本是第二个成功追赶的典范。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开始崛起,人均GDP用了4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追赶国家。亚洲“四小龙”是第三个成功追赶的典范。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用了30年的时间追赶上西欧国家。中国将是第四个成功追赶的范例。中国经济从1978年开始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加速追赶美国、日本、西欧诸国等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逐步缩小与这些国家或地区间的发展差距。1978—1995年西欧12个国家GDP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中国GDP年平均增

长速度为7.5%,是西欧12个国家的4.4倍。到1995年,中国人均GDP相对于西欧12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9.1%上升为1995年的19.0%。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工业化后来者,发动工业化时间晚。1750年起,欧洲和北美陆续开始工业化,而中国滞后了100—200年,直到1950年中国才正式开始发动工业化。中国不仅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而且工业化水平起点极其低下。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从1978年以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和世界人均GDP水平之间的差距。中国人均GDP与欧洲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52年的8.15倍缩小到了1995年的5.3倍;与美国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52年的19.8倍缩小到了1995年的8.8倍;与日本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52年的4.4倍扩大为1995年的7.4倍;与世界人均GDP相对差距由1952年的4.2倍缩小到了1995年的2.0倍。综上所述,中国是一个后进国追赶现代化先行国的成功范例,其经济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高于前三个后进国追赶先行国的成功典范的经济增长率。

21世纪序幕揭开之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之一,并将在今后20年内(202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成为最强大的世界贸易大国;中国的科技发展效应正在逐步展现,并以高科技出口大国为目标,逐步成为世界主要工厂;当然,中国也将继续保持资源消耗大国和进口大国的地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展望2020年,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即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全面发挥将有效实现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趋同”,从而改变长期趋异的状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符合国家生命周期^①,也符合现代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应战”模式,如果我们能够对现代化挑战作出积极主动的应战,中国将继续走向强盛。21世

^① 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久性的强国,也没有永久性的弱国。国家就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大体可以经历五个时期:经济发展准备期或准备成长期;经济发展迅速期或迅速成长期;经济发展强盛期或鼎盛期;相对发展缓慢期;国力衰落期。

纪前半期是中国经济社会步入快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国内条件基本具备、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的基础上,全面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创造竞争优势,努力实现后发优势,充分参与全球经济体系,则实现速度快、效益好的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

三、我对中国崛起的认识

我对中国崛起的认识,始于探讨中国如何抓住历史机遇,着眼于分析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总结中国崛起遇到的重大问题和重大挑战,研究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最终落脚于分析中国崛起的发展模式。总结我的研究历程,可以说,中国崛起之路就是我多年来的研究核心。

1989年,我在第一份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对中国历史长期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和考察,认为1950—198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准备阶段;1980—2020年是中国现代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将由低收入水平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经济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社会进行全面深刻的变革,储蓄率、积累率保持较高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2020年后中国将进入现代经济稳定增长阶段。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在国情报告中指出了四大挑战:人口继续膨胀与迅速老化,就业负担沉重;自然资源日益紧张,接近资源承载极限;环境污染迅速蔓延与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迅速扩张与粮食增产举步维艰。我们认为,生存与发展是中国历史的主题,因此应当选择新的现代化模式,即不同于欧美传统现代化道路的新模式。这一非传统现代化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能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和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贸易与非贸易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该发展模式的资源消耗和生活消费的特点是:在20世纪内和21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均各类主要资源消费水平

大体保持目前的水平或略有提高,并在上述消费数量的约束下调整结构,提高质量。在积累与消费水平的长期选择上,应保持较高的积累和适度的消费。

这是我们当初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最初设想,即在人口、资源、环境等制约条件下,寻求稳定发展。当时也看到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认为如何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当时对中国经济增长给予较保守估计,认为中国在这一时期(1980—2020年)经济增长率大体在6%—7%之间。后来的经济发展表明,实际中国经济增长率大大超过了这一估计。

1995年,我在第四份国情报告《机遇与挑战》(科学出版社,1995年)中详细讨论了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我认为,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这包括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转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体制转型、由第二代领导人向第三代领导人交班的代际间领导权交接。这三大背景表明,中国经济发展既处在很好的发展机会之中,同时也面临无法回避的重大挑战。我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在走向21世纪时会遇到哪些最严峻、最重大的挑战?我们应作出怎样的响应,去迎接这些挑战?

我指出,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粮食问题都是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而在人口过多与资源紧缺这对矛盾中,人口过多始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资源短缺的方针是开源与节流并重,并建议采取如下四个战略:(1)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2)充分利用我国的人力资源,提高人口素质,发挥人口众多的优势;(3)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4)实行开放型的资源发展战略。

与此同时,我还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腐败现象以及党和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进行了研究,指出上述挑战是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和经济起飞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的问题,而且上述挑战是相互联系的。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提出中国既面临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历史机遇,也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和制约,中国只有采取正确的战略才能实现21世纪成为世界新兴大国的目标。我建议,中国走向21世纪的基本发展战略是:(1)稳定和渐进战略,即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应采取渐进的办法来实施各项重大措施,以减少失误和动荡;(2)经济发展的持久战战略;(3)适度高速发展战略;(4)高度开放战略;(5)科教兴国和教育兴国战略等。^①

尽管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崛起面临重大挑战,我仍然深信中国能够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挑战,吸取国内外成功的发展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实现长期持久的高速发展。为此,我对中国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和促进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我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起飞的过程之中,具体体现为经济增长率相当高、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实力成倍增长,同时经济结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中国经济起飞和大国兴起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基本因素,包括:第一,从资本存量和资本来源看,中国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和储蓄率,利用外资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和开辟了新的渠道;第二,从工业基础看,中国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第三,从社会基础设施看,中国的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城市公用事业有了相当的改观;第四,从国内市场条件看,市场巨大无疑是中国的重要优势;第五,从人力资源看,中国人力资源极其丰富。以上因素决定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起飞不同于其他国家,它将伴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大国。^②

同时,我对中国崛起的国际影响也非常关注。我在1995年指出,中国的起飞意味着世界1/5的人口进入现代社会,中国的起飞将影响和改变21世纪的世界格局,并对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③就此,我对中国崛起的追赶模式进行了总结,强调中国的追赶模式体现了速度效应、结构效应、开放效应、制度效应等。具体地说,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明显高于先行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以承载世界

①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72页。

② 胡鞍钢:《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3—246页。

③ 同上,第244—247页。

人口1/5的大国规模,打破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后进国家中经济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中国的经济结构指标变动率快于先行国的变动率,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整个国家带来变化,而且引起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经济增长会促进劳动力向生产力更高的部门转移,而结构变化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中国从改革前的极端闭关自守发展到赶上世界大国标准的水平,参与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明显加快,体现出开放的重大效应;同时,中国市场化程度由改革初期的1/4上升到20世纪末的3/4,市场化程度明显提高,经济运行已基本奠定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之上。^①

中国崛起最深刻的影响应该是提供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21世纪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取决于我们选择何种发展战略。战略性发展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发展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可以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以及人口政策的三大失误延误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而改革、发展与稳定以及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又大大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总结中国实施的追赶战略,我认为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追赶战略: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追赶战略,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战略构想和60年代的“四化”战略构想。二是转轨时期的追赶战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步设想”,这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加速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这一战略仍然以物为中心,以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也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以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等问题。

21世纪中国的大战略应汲取新的原则和思想,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我认为,中国21世纪初追赶战略的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① 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249页。

中国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

	传统追赶战略	转轨期追赶战略	新的追赶战略
发展目标	追求高速度 超英赶美 2000年实现“四化”	以物为中心 追求高增长, GDP翻两番	以人 为中心 促进人类发展, 实现持续增长
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高积累、低消费 强调生产性投资	较高积累、刺激消费 强调硬件投资	强调软件投资 强调人力资本投资
产业发展结构	优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军事工业	利用比较优势 重视产业结构调整 科教兴国战略	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促进结构变革 知识信息发展战略
工业化技术路线	自主开发技术 资本密集技术路线	开发与引进技术相结合 重视劳动密集技术路线	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 多要素密集技术路线
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关系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进口替代 主要依赖国内资源和 市场 国内保护主义	对外开放 出口导向增长 利用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 逐步贸易、投资自由化	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提高国际竞争力 利用国际资源、市场、 资本和技术贸易、 投资自由化
人与自然的 关系	资源高消耗	先污染,后治理	可持续发展
收入分配关系	平均主义	“先富论”	“共同富裕论”
城乡关系	城乡分割	城乡差距拉大	缩小城乡差距
经济体制	基于计划经济	引入市场机制	基于市场经济

资料来源:胡鞍钢等:《大国战略——国家利益与使命》,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21世纪头20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它既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一个各类社会矛盾凸显的挑战期,我们对中国国情又进行了第四次新的认识。中国的崛起是十几亿人民创造物质财富、创造知识文化、创造历史纪录的过程,它是全面的崛起、迅速的崛起、巨大规模的崛起,也是从未有过的崛起。今天我们站在发展与崛起的新的起点上。

我们对五大国综合国力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各类战略资源中经济资源、资本资源和总人力资本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幅度分别为8.84%、7.93%、6.4%,它们对综合国力迅速上升的贡献率分别为43.9%、19.7%

和15.9%，三者合计达到了80%；知识资源、国际资源、自然资源、政府资源和军事资源占世界的比重提高幅度最小。这说明中国过去20多年的崛起是迅速崛起、全面崛起、全方位崛起，也是不平衡崛起、不协调崛起、不匹配崛起。具体地说：

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综合国力国家，与美国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1980年的5倍缩小到2000年的2.5倍；在构成综合国力的八类战略性资源方面，中国与美国相比是“单个优势，众多劣势”，即中国在总人力资本方面独具优势，而在其他七个战略性资源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劣势和差距。中国今后的长期发展目标之一就是使综合国力再上一个大台阶，进一步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和各类战略性资源方面的相对差距。

中国已经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按实际购买力平价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1978年以后，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比重迅速上升，由1978年的5%上升到2000年的12.5%。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或超过世界人均水平，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左右，将建成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目前，中国主要工业产品（除发电量、汽车等少量工业产品之外）产量已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的比重从1975年的3.4%迅速上升到2002年的21.5%，已经大大超过美国（为17.1%）。今后中国不仅要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而且要加快服务业发展，以进一步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相对差距，同时也创造大量的新增就业岗位。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投资国。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国内投资额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4.4%上升到2000年的18.2%，已经超过美国（为16.2%）。中国每年新增的住宅面积相当于美国的4—5倍，中国水泥产量相当于美国的8—9倍，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和建材消耗国。目前，中国的资本存量相当于改革初期的8倍，相当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00倍。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资本驱动为主，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占50%左右，还需要加速从资本驱动向技术、信息、知识驱动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促进经济增长的

重要作用。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吸引国。2003年中国出口额为4380亿美元,接近于美国1992年的出口额(4480亿美元),而1978年中国出口额为975亿美元,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出口额(1950—1955年为900亿—1100亿美元)。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

中国已经是世界人力资本最大的国家。其总人力资本(指15岁到64岁人口与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在过去20年翻了一番,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近20倍。中国总人力资本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由1980年的17.6%提高到2000年的24.0%。中国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人口增长了近10倍,各类高等教育学校在校生人数已经超过美国,今后将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教育与培训市场之一。这反映了过去20多年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教育投入政策的“红利”,促使其庞大的人口包袱逐渐转化为创造经济财富的人力资源。

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难题就是为占世界总劳动力1/4的各类劳动人口提供就业岗位。这包括为每年上千万新生劳动力提供新岗位,为上千万下岗、转岗人员提供再就业服务,为上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创造非农产业就业机会。与此同时,还要为世界最庞大的老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和社会服务。中国在比工业化国家收入水平低得多和老年人口总数大得多(将近2倍左右)的条件下快速进入老年社会,其挑战性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今后,人口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成为中国未来现代化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由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中国自然资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将大幅度上升,资源供需矛盾加大,特别是土地、水资源、优质能源和大宗矿产品的需求压力尤为突出。中国各类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同程度地低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世界上自然资产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耗水量第一大国(占世界用水总量的15.4%),每日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相当于美国的3倍),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位(2000年分别相当于美国的49.7%和51.4%,到2020年有可能

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实际上,中国现在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不洁能源的生产国和消费国。2003年中国煤炭总产量占世界总量的33.5%(美国为21.9%),中国煤炭消费量占世界总量的31.0%(美国为22.3%)。这都大大地超过中国人口和经济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也对全球生态环境形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承受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突出的生态环境挑战:土地资源大规模严重退化,水生态环境恶化,草原退化情况相当严重,森林赤字还在扩大,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城市空气污染依然突出,自然灾害受灾率、成灾率和经济损失继续上升。这迫使中国必须摆脱和抛弃黑色发展之路,既不能沿袭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也不能模仿和采用高消费、高消耗、高排放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必须独辟蹊径,寻求绿色发展之路。

总体来看,进入新世纪,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已经发生深刻变化。与改革初期相比,发展的有利条件在增多,发展的各种机会在扩大,发展的各类优势在增强,处在经济发展、迅速崛起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与此同时,发展的各类矛盾日益凸显,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地区发展差距、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就业社会保障压力、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构成更为复杂、更为紧迫的重大挑战。中国长期发展中资源环境的挑战最为突出,未来几十年形势更加严峻,将成为现代化的最大制约因素。

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照搬和模仿苏联式的重工业化模式,即以资本密集、低就业能力、资源高消耗、环境重污染、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的重工业为导向的模式。这既不符合中国人均资源短缺、资本稀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基本国情,也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改变了这一增长模式,尤其是“九五”期间通过大规模结构调整有了明显改观,出现了经济增长、能耗和污染排放总量下降的趋势。但是进入“十五”,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逆转,重新转向低质量、低效益、高资本投入、高能耗和污染排放的增长模式。

中国必须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充分利用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效节约、利用稀缺的自然资源,大力引进和开发知识资源。中国需要选择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应该是:较高的人文发展指标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消除收入贫困、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避免经济财富和知识资源的贫富两极分化;走绿色发展道路,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的生活体系;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实现充分就业,促进人类发展。

四、现代中国崛起的六大目标及发展模式

鉴于中国基本国情的独特性,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均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也不同于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片面强调重工业化的苏联模式和追求高消耗、高消费、高增长的美式模式均不适合中国,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实现和平崛起,就需要找到属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中国的崛起之路。要追求绿色发展,提供绿色贡献,实现绿色和平。绿色崛起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

综观已经或大体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传统发展战略,无论是欧美还是日本,尽管各自的国情特点、发展条件等方面有所不同,但仍有两个显著的发展特征:一是用对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高消耗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用对生活资料的高消费来刺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发展模式。总体而言,这一传统的发展模式遵循着效率优先、增长优先、竞争优先和物质生产优先的原则,具体地说:追求资本生产率而忽视资源生产率,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对环境的副作用;简单地认为GDP的增长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类福利而不考虑分配不公平和自然资源的损失;追求工厂规模更大、效率更高、产品更多、竞争优势更大,但同时忽视对自然、人体健康、外部环境的损害和对贫困人口的人类关怀;强调大批量生产、大批量消费、大批量排放、大批量浪费,忽视服务和使用价值。其结果必然是,忽视环境破坏所带

来的潜在成本。然而,某些环境破坏具有不可逆转性,即使可以逆转,它对于人类的福利仍然是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对穷人和弱势群体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环境破坏直接摧毁了他们的生存基础。

对比中国的条件,我们认为,中国不可能按照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从而实现国家的崛起。这不仅是因为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而且有着中国自己的独特理由。具体地说:第一,欧美、日本等在发动工业化时,就积极参加了国际贸易,与世界市场相互联系起来,以战争和殖民方式积累原始工业资本,开拓国际市场,靠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两个轮子促使经济起飞。中国经历了百年磨难开始对外开放时,国际市场早就被分割完毕,以初级产品为主的贸易结构使之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第二,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时间晚,经济发展起点低,与工业化国家相比,生产技术和开发、利用资源能力差距甚大,虽有后发优势,但障碍重重。第三,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及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没有条件实现高消耗资源生产型、高消费生活型的物质高度现代化。第四,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第五,中国不可能像过去的工业化国家那样通过战争和资源掠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只能从中国的内部改革和发展之中寻找出路。第六,按照传统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增长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

鉴于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必然不同于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而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非传统现代化发展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实行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经济体系,保证社会效益与社会公平的社会体系,不断创新和充分吸收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技术体系,促进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的、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等。^① 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代表着我们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也代表着我们对非传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探索,代表着我们对基于中国基本国情的战略选择。这是中国协调人

^① 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58页。